

王邦直律学思想体系的提出早于世界著名音乐理论家法国的梅森109年;早于世界伟大音乐家德国的巴赫145年。

最保守地认为,也比世界上公认的“十二平均律”创始人朱载堉《乐律全书》提出“律学思想”的时间早30年以上。

《律吕正声》成就律学宗师王邦直

□ 蔡连卫

今年,是王邦直诞辰五百周年。“昔人虽已歿,千载有余情”,此时,我们既应该深入探讨他的律学思想,也要学习他大胆怀疑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书香门第的大孝子

王邦直(1513-1600年),字子鱼,号东溟。著有《律吕正声》六十卷,是明朝具有一定成就的律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王邦直祖籍即墨。即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曾先后有即墨三大夫、田单、田横等仁人志士在此建功立业,也曾有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读书不其山下,还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历法《太初历》的制作者西汉天文历法专家徐万且、三世以清廉著称的西汉名臣王吉王骏王崇祖孙等名臣学士,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周黄蓝杨郭五大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但即便在地灵人杰人才辈出的即墨,王邦直的家族也堪称书香门第。

自明代起,王邦直家族就自认为 是汉谏议大夫王吉的后裔,当地很多缙绅学士也这样称呼他们。但因时代久远,王氏家族是否确系王吉后裔已经很难查考。根据目前的可靠记载,王邦直的先祖王守信,是元朝的处士,也就是一个有才华品德但却隐居起来没有出来做官的人;二世祖王伯举是洪武年间的岁贡生,官至广东按察使司按察使;三世祖王载和四世祖王璧都好读书,娶的也都是官员之女;五世祖王振明于法律,擅长地理阴阳之学,娶的是尚书之女;五世叔祖王援是贡生,官至教谕。王邦直的六世祖即其祖父王佐,是副榜成化丙午科的举人,做过山西忻州学正,曾在即墨东关南北街上兴建飞黄坊,来彰显功名并激励子孙。王邦直的父亲王镐是岁贡生,曾任顺天府蓟县训导,后来升任山西临县教谕,著有《渌志》、《临志》二书。王镐博学多识,为人又刚直方正,所以很受书生们爱戴,在他卒于任所灵柩返乡之时,书生们都哭泣着来送别;王镐还深得同乡名士蓝田的赏识,被蓝田赞誉 为“大学奥义,无不贯彻,诸子百家,无不精研”。可见,王氏家族是一个尊崇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世代读书科考的书香门第,也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小官宦之家,而且家族成员为官者又是以教育部门官员为主。

明代正德八年四月十八日,王邦直就出生在这个书香世家。王邦直天性聪敏好学,幼年参加童子科考试就受到考官的赏识。王邦直还十分孝顺,在他母亲去世时,他异常悲伤,写了百首《黄鸟诗》,来抒发自己的丧母之痛,因为诗歌感情真挚深沉,令读者为之悲叹。后来他的父亲王镐在山西任所突发疾病,等王邦直接到书信赶到山西时,父亲已经入棺,他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为此他捶胸而哭,极度哀痛。随后,王邦直赤足步行二千多里路,将父亲的灵柩运回即墨,路上脚趾生了冻疮,他也不肯裹足而行。返乡后,他又按照父亲的遗言,请蓝田亲自为父亲撰写了墓志铭。可见,王邦直是一个大孝子。

耕读之余专心著述

嘉靖年间,王邦直成为岁贡生,也因此进入仕途,成为河北盐山县丞。县丞相当于副县长,在当时是一个正八品的芝麻官。王邦直为官清廉耿直,不收受一分钱财,还曾经变卖祖产以补充官府开销。任职不久,王邦直就以汰员身份赴京城参加改选。

王邦直在京城等待改选之时,恰巧赶上朝廷因为灾异要求臣民上书言事。王邦直便针对时



弊,上书讨论时政,列举了十条:“一曰减赋役以招流移;二曰实仓廩以备凶荒;三曰戒有司以去奢侈;四曰清驿递以革冒滥;五曰禁势豪以除暴横;六曰正仕途以塞奔竞;七曰重功绩以明考课;八曰慎作养以剔繁冗;九曰严简练以修武备;十曰振纪纲以励风俗。”这十条措施,是王邦直针对当时天灾多发百姓流离失所,土地高度集中普通百姓没有田产、外患频仍边境告急、吏治腐败奢靡盛行等时政弊端提出的,既对症下药,又切实可行,因而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赞许,要求主管官员不要因为王邦直官职低微就不采纳,合适的建议就斟酌施行。但是因为王邦直的言论当中有很多讥切时政的地方,甚至曾明指要罢某个当权者之官,这当然犯了官场大忌,也因此触怒了当权者,所以王邦直不久就被罢官。王邦直就此结束了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京城待选,这是关系一个官员政治前途的关键时刻。为了有一个好的前途,此时很多人都在京城找门路走关系,对上疏言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在这样敏感的时刻,王邦直却直言进谏直指时弊,丝毫不介意自己政治地位的低微,也毫不计较个人政治前途的利害得失,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正直勇敢无私忘我的牺牲精神。

王邦直罢官后,返回故里即墨。王氏家族祖居即墨王乾,后来王佐这一支迁居即墨县城,王邦直出仕之前和返乡后都是在即墨县城度过的。像一般风雅的隐居文人一样,王邦直归隐山林后,也在自己的院中筑了一个小阁,并在此闭门读书。在即墨城东北半里之处,有一座镜谿山。在风水家看来,即墨县脉来自盟旺山,镜谿山所在的位置是县脉之上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在此建起

一座仅有一丈高的小土山,并竖起一块石头作为山峰,用来延续县脉,因为此山又小又圆如同“镜谿”,所以命名为“镜谿山”。王邦直的住所距离镜谿山很近,所以王邦直就将自己读书的小阁命名为镜谿山房,在耕读之余专心著述。有人说王邦直返乡后住在镜谿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镜谿山只是一座三米多高的人工小土山,根本无法居住,另一方面作为诗书仕宦之家的王邦直家族也不可能安家在即墨人认为的延续县脉的风水宝地之上。

归隐山林,为往圣继绝学

经过近20年的苦心研究探索,王邦直完成了《律吕正声》六十卷。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十二日,王邦直去世,享年88岁。崇祯十五年(1642),王邦直成为即墨乡贤。乡贤是品德和才学都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由此可见王邦直在即墨的声望。王邦直有两子两女。两个女儿都嫁入了即墨最有名的名门望族,长女嫁给了蓝田的族孙,次女嫁给了黄作孚的三儿子黄师善。王邦直的老子王一元是庠生,擅长弹琴作画,喜好史书,孙子王嘉瑞擅长作画,尤其喜好松竹。曾孙王馨二十八岁去世,妻子江氏为之殉节。曾孙王秘由王邦直女儿抚养长大,后来迁到小庄,也就是今天城阳区的惜福镇的小庄村,此后绵延不绝,直到今天。

《律吕正声》是王邦直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王邦直今日仍为世人所知的最主要原因。万历四十四年(1586)夏四月十八日,也就是王邦直74岁生日当天,王邦直写了《律吕总叙》,回顾了自己二十年的艰辛创作历程。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王邦直82岁时,《律吕正声》被同乡翰林周如砥呈送

给国史馆。万历三十六年(1608),也就是王邦直去世八年后,《律吕正声》由王邦直的姻亲黄嘉善、外孙黄宗昌刊刻,并请李维桢、林增志作序,刊刻者署名为王邦直的亲家黄作孚,这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的明万历三十六年黄作孚刻本《律吕正声六十卷》。清代康熙年间,王士禛在明史馆,也曾经呈送《律吕正声》。乾隆年间,《律吕正声》被编入《四库全书》,并由四库馆臣撰写了提要。

全书原分为13册60卷洋洋30万言。该书“有图、有解、有制、有义、有体用、有统会、有经纬”,共有图表64个。是所辑32部乐类书籍中册数、卷数、页数均为最多的一部。相形之下,纵横比较,王邦直的律学思想体系的提出早于世界著名音乐理论家法国的梅森109年;早于世界伟大音乐家德国的巴赫145年。最保守地认为,也比世界上公认的“十二平均律”创始人朱载堉《乐律全书》(明万历丙午1606年)提出“律学思想”的时间早30年以上。

在《律吕总叙》中,王邦直直言,他是因为担忧律吕失传,并感伤于很多儒生的牵强附会,才进行律吕研究的。他还坦承,他不辞辛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他的研究有助于国家的礼乐制定,并为往圣继绝学,同时也是用乐进行教化。可见,王邦直虽然已经归隐山林,身在草野,但是却依然心系国家。

《律吕正声》对我国律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和阐述,同时,对律吕相应等声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王邦直认为汉唐以来的律吕都有谬误,不是三代以上的律吕,因此他溯源穷流,并参考大量史书,重修制定律吕。书中还收录了伯牙学琴、海阳僧人等音乐故事,记有部分琴谱和民谱。

因为王邦直的《律吕正声》既借鉴古人的说法,又有自己的独创,建立起了自己科学严谨的律学体系,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周如砥认为,徐万且治太初历第一,千载之后王邦直可以与其媲美。《明史》也对《律吕正声》做了简要评论,并称赞王邦直著述非常的详备。《四库全书提要》也称赞王邦直的《律吕正声》援引浩繁说理精辟。遗憾的是,因为王邦直不过是一介布衣,他的律学思想和音乐教化理想都无法得以施行,更多的停留在了理论层面。

尽管如此,王邦直的律学思想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律吕正声》还曾远播日本,几年前,日本的两位著名音乐学专家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捐赠了一批宝贵的音乐资料,其中就有《律吕正声》。王邦直的律学思想也推动了青岛地区音乐文化的发展。清代以来,青岛民间音乐兴盛,特别是崂山道教音乐、胶州秧腔以及莱西鼓吹乐等青岛本土著名的音乐品种蓬勃发展,这些恐怕也与王邦直律学思想的流风余韵有关。进入二十一世纪,王邦直的律学思想,更为当前青岛“音乐之岛”的文化品牌注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为“音乐之岛”寻觅到了历史文化的坚固根基。

律学思想之外,还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待选汰员,王邦直敢于直言时弊大胆进谏;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后学之辈,王邦直敢于批判传统大乐之制并重新制定律吕;作为一个罢官家居的布衣之士,王邦直积极著述希望有助于国家的礼乐教化。这些充分体现了王邦直“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使命感以及不迷信权威大胆严谨的怀疑创新精神。王邦直大胆怀疑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更是传统文人相对缺乏却又弥足珍贵的。

■ 山海经

“石河县”

□ 张所昆

“淹了石河县,立了日照城”,这个民间传说,在日照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相传现今日照市石白所以东广大海面,古时候是一片陆地,石河县就设在这里。石河县里民风败坏,坏人行恶不止,不曾想冒犯了东海龙王神威。龙王略施手段,就见怒涛汹涌,海啸裹岸,偌大的石河县消失了,变成了一片汪洋。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坏人们都被淹死了,好人们因提前得到了暗示,都跑到一处山岭高地上,保住了性命。他们在这里居住下来,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新城。因为大难过后,恰逢红日东升,人们就把这个新城起名叫“日照城”。

据考证,日照历史上,从无“石河县”名称,倒是有“西海县”设置。《日照市志》载:“西汉时,日照地区始置县,名海曲……。又西汉元帝时,封城阳菟子王光为昆山侯。日照之西北境(今五莲县)属昆山侯国。东汉时,废昆山国,日照更名为西海县。三国魏时,废西海县,并入莒,属青州城阳郡……”日照古称“西海县”,前后也就是百余年的历史。宋元佑二年(1087年),取“日出初光先照”之意,置日照镇。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置日照县。

“石河”与“西海”发音接近,可谓谐音,民间传讲过程中,难免夹杂方言土语,又因年代久远,笔者揣度:“石河县”当为“西海县”之讹传。

日照历史上果真发生过海啸。《日照市志》“大事记”载,“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大海啸”,“1668年7月25日,地震声如雷,山崩地裂、涌水喷沙,民家堂奥出水,洪宁镇(今五莲县)地陷如池”等。石河县的故事传说,是否缘由曾经发生过的海啸或水灾,不得而知。

关于水淹石河县的传说,逸闻趣事有很多。有人说石白海底有石痕,有通往石河县的古道;也有人说过去渔民从海里拉网,曾拉上了似为石河县的官印;还有人传言,昔时落大潮,海中曾显现出古城门楼,云云。抛去传说中的神话色彩,查阅相关典籍史志,未曾见过石白海底有古代城邑的记载。

另有些旧文称:石河县是春秋晚期纪鄆城延续下来的一个县城,在今江苏赣榆东北。宋金时期,石河县遭遇一次海洋地震被淹没。尔后,金朝当局将日照镇升格为日照县,延续石河县的建制,遂有“淹了石河县,立了日照城”之说。

“淹了石河县,立了日照城”,属于日照的民间传说。耐人寻味的是,省外不少地方也有类似的传说,内容大同小异,只是地名有别。“沉落山阳县,余出无锡城”,江苏无锡民间就广为流传。据了解,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也有类似的故事传说。

对此,不由令人联想起著名的“诺亚方舟”传说。据《圣经》故事《创世纪》记载:上帝因世人行恶,曾降洪水灭世。因诺亚一家行善,维护正义,故命他制造方舟,率全家并选取所有禽兽各一对避难,因而使人类得以留传。

细细琢磨“淹了石河县,立了日照城”的传说,在情节立意上,与“诺亚方舟”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国内多个地方都有类似传说,莫非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纷纷模仿“诺亚方舟”故事,进行移花植木,嫁接出了当地版本的新传说,也未可知。

传说不等于历史。《日照市志》在书后附录中刊载了“淹了石河县,立了日照城”的传说,并特意加了注:“日照历史上从来没有‘石河县’,只是一个神话传说而已。特此声明,勿以为真。”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海岱一方

卫礼贤眼中的清末遗老

□ 李之凡



伟便在汇泉湾畔建了一座二层欧式别墅,一家人从最初租住的旧房子里搬了过来。1913年,溥伟笼络一批旧臣,打算与手握兵权的张勋联络复辟清室。但因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派人监视严密,消息泄露,溥伟无奈放弃。此后他与卫礼贤在一起时,很少提及自己的往昔。有时谈起家族之事,他也只是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譬如,瘦高的康熙颌下留着屈指可数的几根细长胡子,有一双目光锐利的眼睛,雍正的胡子是卷曲上翘的,等等。

一战爆发后,溥伟坚决不走,但他每天都去找卫礼贤,同他讨论青岛及欧洲的战局。1914年11月,日军占领青岛。开始,日本人不断向溥伟示好,企图拉拢这位前朝的恭亲王,溥伟礼谢不就。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曾经雄心勃勃的溥伟,这回彻底死了心。1922年12月青岛收回中国后,42岁的溥伟带全家迁到了日本人统治下的旅顺。1931年,溥伟一改过去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态度,在沈阳就任伪东北四省纯正民意独立政府建设研究会会长,宣称“满人治满,决与日人合作到底”。

保皇派辜鸿铭:对什么也看不惯

卫礼贤与辜鸿铭第一次见面是1913年,时年56岁的辜鸿铭来看在青岛大学读书的儿子。卫礼贤对被德国人赞为“中国歌德”的这位文化名人早已耳熟,1911年就着手将其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译为德文。第一次在青岛相见,卫礼贤与大他16岁的辜鸿铭成为朋友。之后,辜鸿铭经常来青岛或短或长停留,卫礼贤形容他“总是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他的活力和刚健的耐久力丝毫不比任何欧洲人差”。

两人在一起不仅仅探讨学问,辜鸿铭固守已见且“充满各种怪念头”,他“诅咒和诟骂新纪元、

革命,以及他认为该为这些事情负责的外国人”。这时他辞去公职到处讲学。与溥伟一样,他也不剪掉脑后稀疏灰白的辮子。

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游历中国来到青岛,卫礼贤介绍他与辜鸿铭相见。宴席间,辜鸿铭“谈话的火焰就像闪出的火花一样迸射”。凯泽林说话时,辜鸿铭总是迫不及待,等不到轮到自已,就将中文、英文、法文和德文混在一起,又说又写。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

卫礼贤回忆道,“这位东方哲人的心灵和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感觉,包括整个世界的历史和神圣的创造计划,以及远东的精神和西方的野蛮掠夺”。整个晚宴间,几乎是辜鸿铭一个人在说话。宴席结束时,地上满是撒落的碎纸,上面写满了欧洲和中国的格言、各种建议等。凯泽林面对卫礼贤感叹,“辜先生确实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大学者”。

北洋大臣陈夔龙:痛哭“自责”

清帝逊位后,避居青岛的还有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陈夔龙一直对变法极为反感,坚持“祖宗成法”,认为“科举一废,土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对辛亥革

命,他更视为“大逆不道”,“作乱犯上,自取屠戮之威”。在青岛期间,陈夔龙却谨小慎微,没有参与复辟活动。

“幽默感使他显得非常出众。”这是卫礼贤给他的最初评价。接触久了,卫礼贤慢慢发现,陈夔龙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却故意装成放荡不羁的样子。在这段特殊时期,落魄、激愤的清朝遗老旧臣,生活中最不可缺的一项内容就是喝酒、借酒消愁,藉醉泄愤,以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经。在这种场合,善于文辞的陈夔龙总是有笑话说可讲。酒量大,又能忽悠,陈夔龙可称为这个小圈子的酒场领袖。卫礼贤称,只要有陈夔龙参加,聚会结束时,肯定会有几个醉得一塌糊涂,被他讥讽的牺牲品。

陈夔龙书法,诗文俱佳,当时京城有不少他写的店铺招牌。卫礼贤听说,后来陈夔龙给人题字并不收钱,有歌女陪伴,好好吃一顿就满足了。甚至到眼睛快看不见时,他还书写自作的诗词。有人冒名模仿他的字招摇撞骗,陈夔龙知道后并不生气,只是笑笑:“那些知道我的人不会受骗,其他受骗的人不值一提。”

1915年5月的一天下午,卫礼贤照例应邀去拜访陈夔龙。卫礼贤见他没有了往日的潇洒,心情显得很沉重。原来,陈夔龙听说袁世凯同意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怒恨难解。当着卫礼贤的面,60岁的陈夔龙止不住泪流满面,像孩子一样哭泣。卫礼贤极力安慰他,可陈夔龙就是不听,带着哭腔说:“事情变成这样,全是我们的错。没有人让我们去保卫自己的王朝,现在我真不想活了,生命已经一文不值了。”卫礼贤回忆,这晚陈夔龙狂饮不止,酒杯都夺不下,整个房间里都回荡着他的狂笑声。不久,陈夔龙离开青岛去了上海。